

从战国带铭铜戈看蜀文字的存在

梁文骏

古代蜀国有文字吗?二千年来还是一个谜。关于我国文字的发展情况,曾经有过一段尽人皆知的史实,即在秦未统一六国前,列国都有自己的文字,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把“文字异形”的韩赵魏燕齐楚原有的文字废除,统一使用秦国的小篆,这为后人读书识字倒是做了好事;但也由于这样,列国文字终于失传。然而蜀地的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蜀国以创造性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见称于世,广汉三星堆蜀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即是有力的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东与楚争雄,攻到楚国境内的松滋;北攻秦国,打到秦国境内。加以望丛二帝在川西平原首创的先进农业文化,曾经影响于巴国,使巴蜀经济达到共同发展,即《华阳国志·蜀志》所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在当时有此优越的条件,难道不会产生和创造能够记载事情、交流思想的文字吗?难道《太平御览·州郡》所存之扬雄《蜀王本纪》中蜀人“不晓文字”之说能够成立吗?为了尊重事实,避免空谈,下面拟据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新资料,对此问题略加阐述,以还其历史本来面貌。

建国以来,春秋战国时期有铭文铜戈已发现五件,其形制相同,文饰则均具有巴蜀文化特征。郫县先后出土两件,特别是第一件关系到地方性的被埋藏已久的古文字,它的出现,为学术界开拓了新思路。这不能不说在认识上引起了一个大转折。所以,在谈这一问题时,便把先出土的一件称为第一件战国带铭文铜戈;后出土的,简称为第二件带铭文铜戈,作出详略不同的叙述,然后再及其他。

第一件战国带铭文铜戈,出土时间,1972

年11月。出土地点红光乡7村4组的扬家荒地(独柏林附近)。此戈援长17.8厘米,内长7.5厘米,胡长8厘米。方内,长胡三穿。援在后部至内的两面各铸一虎纹,其头向锋,作张口状,在其口中有穿孔一个,在虎身的后部亦有一圆穿孔。胡的一面铸有椎髻、跪地的人一个,其腰悬刀,背后有巴蜀文饰(从略);胡的另一面有巴蜀纹饰(从略)。援脊下的两面有“D”纹四个。又援脊上,只有一面刻有未能辨认之方块形的古文字一行(由锋向阑的方向排成直行),字数约十余个。

此戈为前所说有椎髻、跪地的蜀人形象,反映了古代蜀人的习俗。又所铸虎纹,据考,在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文物:纯金器和青铜器均见虎形饰,可知蜀器虎形饰时间早,使用范围大。结合蜀人形象来看,此戈虎形纹应为蜀文化的特征之一。而巴蜀文饰,可能是战国时期蜀民族与巴民族融合的反映。再观察这一行方块形古文字,既不是甲骨文,也不是金文,可知不属于中原地区的古文字类型;同时经过学术界大师郭沫若、徐中舒先生断定为失传的地方文字。即所谓不识的死了的古文字。以其在蜀地出土,且戈上的纹饰具有蜀文化特征,故四川考古界的同志亦肯定它是在蜀地通用的固有文字,即蜀文字。此消息发出后,曾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把这个问题作为考古研究的新课题之一。

看来有些巧合,在我县又相继出土了第二件带铭文铜戈。出土时间1976年12月,出土地点晨光乡向阳村二组(张家碾附近)。此戈援长13.7厘米,内长5.2厘米,胡长8.2厘米,阑长1.3厘米。方内,长胡,侧有三穿。内有图案文饰,胡的两面有由上而下的蜀国方块形的古文字各一行(直行),两面文字相同,每行字

数约有 8 个。

而邻县新都也出土(时间和地点未详)中胡三穿的带铭文铜戈一件。胡上也有蜀国方块形古文字一行。

以上在川西平原地区,即出土了这种带铭文铜戈三件,可见这种方块形古文字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在蜀国境内通用的文字。

此外,在川东,重庆市博物馆同志也发现带铭文铜戈一件。出土时间,1973 年。出土地点,万县新田。此戈中胡三穿,在胡侧近阑处,有两个巴蜀符号,略似弓形(从略)。援脊下侧有巴蜀符号 一行 3 个。而在援脊上侧,则有蜀国方块形古文字一行。

在邻省湖南常德也出土带铭文铜戈一件,出土时间,1959 年。出土地点,常德德山(26 号战国墓)。此戈的援末至胡的两面铸有蜀国方块形古文字各一行,且在内的两面均有巴蜀符号。为什么这种铜戈会流传到省外呢?据考,因为常德在古代是楚国的黔中郡,又曾是巴人故地的缘故。

从五体带铭文铜戈基本上都有巴蜀纹饰或符号,其形制又反映出与春秋到战国时代的铜戈有共通之处,特别是字形结构都是方块形成直行的蜀文字,这是显著的特征。现在,据初步统计,铸在五件铜戈的蜀文字约有五十多个。但释读问题还有待于研究。

由于这五体带铭文铜戈,其中有两件是在川东发现(包括湖南常德一件在内),前一段时期,曾把这种方块形的蜀文字,笼统地称为巴蜀文字,虽各抒己见,未尝不可。但考古工作在前进,面对今天广汉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出土的陶纺轮的文献资料,当是这五件带铭文铜戈的文字体系的渊源。三星堆大批蜀文物的出土是举世瞩目的惊人发现,它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出在祖国文化的内涵里有辉煌成就的蜀文化。三星堆也反映了文字发展规律,出土了为数不多的陶文,这些陶文足以证明是蜀人自己所创造的文字,也是蜀人在初期阶段使用的文字,当然它为时最早。观察这种蜀文字趋于成熟之时,可知大约在商代晚期。而成为战国时期带铭文铜戈的字型面貌,可能经过上千

年的变化,不过这种字形虽有发展,但基本形态仍没有变,这就表明这种文字对初期到成熟期的形体都有一贯的继承性。再就字的形象结构而论,确实比直观的象形文字大为进步。因为铜戈上所见文字,已属于表意文字。它的形态已趋向于直笔化和线条化,并已表现出它已达到把字形简化、省略、向定型化发展,而且每个方形字有单位面积小的优点。

说到这里,不妨引用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关于四川古代史有关意见。他认为蜀王杜宇王蜀年代,当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在此期间,蜀地农耕文化向川东巴地传播。根据这一论断,可以推知,蜀文字和符号向川东巴地传播应比农耕技术的传播时间稍晚。

再查巴人的史迹,据考,巴人原居汉水流域与大巴山一带,巴国从汉水流域、大巴山迁徙到川东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晚期。而川东的巴蜀文字和符号出现的年代也与此情况基本符合,这是正常的现象。另外,据《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也是促进巴蜀文化交流的有力因素。

历史事实虽然展现了巴蜀文化融合的情况,但近年考古的重大发现,已知三星堆文物反映的时代经历了夏商周,而战国带铭文铜戈出现的蜀文字,却从三星堆文物找到了根源。因此,从流溯源,这种地方性的古文字,不能不归功于蜀人的创造。

目前,距我县第一件战国带铭文铜戈的出土时间已二十余年。回顾它在郫县出土,能够首次揭示出古代蜀国原来与列国一样有自己创造的通用于蜀地的蜀文字,而不是蜀国无文字,这一历史意义无疑是重要的。

附注(本文参考下列书刊):

(1)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 年第 10 期。

(2)梁文骏:《四川郫县发现船棺葬》,《考古》1980 年第 6 期。

(3)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 130—133 页。

(4)段 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1 期。

(5)铜戈图及蜀文字图分别见于以上书刊。

(作者单位:四川省郫县文化馆)